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东渡西进

——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刘正刚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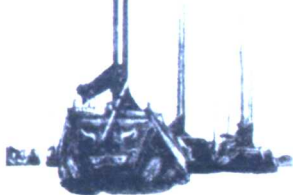
下

海洋
中国与
世界

丛书

杨国桢

主编



东渡西进

——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下)

刘正刚、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 洋
中 国
与 界
世 界
丛 书

目 录

总序	(1)
致读者	(1)
第一章 朝野关注东西部	(1)
○ 东西开发朝廷出招	(2)
○ 政策差异缘由何在	(32)
○ 追求富裕各奔东西	(43)
第二章 血浓于水聚亲情	(65)
○ 陆海分居寻求发展	(66)
○ 枝繁叶茂复制家族	(75)
○ 木本水源延续血脉	(88)
第三章 乡音未改凝乡情	(111)
○ 草根文化之克隆	(112)
○ 故土神祇聚乡情	(127)
○ 有规有矩成方圆	(149)
○ 整合之中渐转型	(162)



第四章 生财有道显特色	(181)
○ 陆海米粮输出地	(182)
一、柳暗花明又一村	(182)
二、农业垦殖各有招	(199)
○ 东西货殖平分秋色	(242)
一、漂洋过海沟通海峡两岸	(243)
二、水陆兼行打造国内市场	(264)
第五章 接触、冲突与融合	(290)
○ 最终成为朋友	(291)
一、不打不相识	(292)
二、故人今再来	(313)
○ 官府扮演的角色	(321)
一、化干戈为玉帛	(321)
二、搭鹊桥结良缘	(339)
第六章 节庆欢娱皆雀跃	(363)
○ 万众欢腾庆节日	(364)
○ 五彩缤纷地方戏	(380)
○ 寓教于乐重教化	(397)
第七章 移民大潮中的另类	(421)
○ 名异实同的祸根	(423)
一、罗汉脚之活跃	(424)

二、咽喉之猖獗	(430)
○ 为害一方难治理	(445)
一、罗汉脚横行不法	(446)
二、咽喉为非作歹	(466)
主要参考文献	(489)
ABSTRACT	(508)

二、搭鹊桥结良缘

四川移民在向四川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垦过程中，并不存在类似台湾的“隘”组织。“三藩之乱”被平定后，随着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迈入正途，四川境内的民族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政府关注。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军向川西不断深入，在打箭炉地方恢复明代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的设置，以此抚治口外48部落，称为“西炉”。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军又进入川南凉山民族区，建立建昌兵备道，管理五卫和各土司。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前后，清军进兵西藏，招抚各部落，开始经营“炉边”，并将理塘、巴塘二部划归四川管辖。这样，四川省的政区开始突破明代政区的范围，向西部藏区推进了一大步，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藏区的开发。雍正年间，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基本走上正轨，清廷除了恢复设置清初被省并的州县外，继续对四川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加大管理力度，通过改土归流政策的施行，废除了旧有的土司制度，把各民族地区的政治建置统一在清政府的政区建置之内。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又对



川、滇、黔三省省界进行调整，省并马湖府入叙州府，改建宁卫为宁远府，将镇雄、乌蒙、东川三府划归云南省，将遵义府划归贵州省，基本上形成了以后四川南部边界的格局。雍正七年（1729年），雅州升为府，成为四川拥有土地最大面积的府，直接管理西炉和炉边广大地区。雍正九年（1731年），裁松潘卫，置松潘厅。雍正十一年（1733年），改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为打箭炉厅，隶属雅州府，并移雅州府同知驻扎，以管理汉藏贸易和关内外各土司及其朝贡事宜。乾隆时，随着移民的大量进入，四川人口的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都相当快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蒸蒸日上。尤其是四川内部地区人口的急剧膨胀，迫使人口不断向少数民族地区转移，加速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正因为如此，朝廷先后对这些民族地区的行政建置进行了调整，乾隆元年（1736年），裁黔彭直隶厅，并改酉阳土司为酉阳直隶州，将贵州永宁县划入四川，改为叙永直隶厅。^① 在雅州府和酉阳直隶州境内，有相当广泛的闽粤移民迁入扎根，其中雅

^① 以上参阅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第20章，“清”，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州府属的县共有广东人建立的南华宫 3 座、福建人建立的天后宫 4 座，酉阳直隶州有天后宫 2 座、南华宫 2 座以上，因为州属彭水县的南华宫是县城 1 座，乡镇多有。^① 伴随着四川地方建制的发展和完善，乾隆十四年（1749 年），裁四川巡抚，专设四川总督兼理巡抚事，治所在成都。自此以后，四川总督的设置一直保持到清末。

虽然清代一些大臣的奏折常常刻意将台湾的生番与云贵等西南地区的“苗蛮”进行比较，事实上，清政府对移民与二者的关系还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云贵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秦汉以来就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汉武帝时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牂柯、越巂、益州诸郡，唐宋统治者通过羁縻政策将西南地区纳入国家的政治统治体系之中。虽然当时的统治相当薄弱，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汉化或封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自元代开始，中央政权在总结以往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对西南地区实行了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

^① 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27、230 页。



——土司制度，以有效地实行行政管理，即由中央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通过他们对各族人民实行管理。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制定了一整套的土司贡赋、承袭制度，所有土司无论是新封授还是承袭，均要由朝廷任命，颁发印信、号纸。土司必须受地方长官约束，有驻防、守御之责任，并随时备征调。不仅如此，明代还改变以往这些地区只征土贡、不征田赋的状况，规定土司要“额以赋役”；明代为土司专设职衔，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现象，这也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标志。土司制度的实行，是西南各少数民族从“化外”到内属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随着各民族在西南地区的长期交流和迁徙，民族之间的联系已经更加密切，尤其到明末清初，经济上的互通有无已成为各族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土司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日趋尖锐，土司抗拒朝命甚至拥兵反叛，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这一矛盾到雍正时非常突出，例如，四川酉阳土司“无恶不作，擅敢设立五营、副将五人，守备五人，千

总二十人，把总四十人”^①。土司还经常到内地掠夺人口，雍正四年（1726年）东川土司不时“绑架人口，劫抢牲畜，不一而足”^②。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雍正帝开始废除大批土司，实行流官制度。改土归流以后，四川新设宁远、雅州、叙州、龙安等府，几乎占据了四川面积的一半，涉及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但与其他省份相比，雍正时期四川的改流很不彻底，是保留土司最多的省份。^③上述情况说明，至少自秦汉开始，中央政权一直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民族的汉化也在不断深入。尽管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上层时有冲突，但总体趋向是中央对西南地区的民族控制在不断加强。

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台湾相

① 《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上海点石斋石印本，1887年版，第28册第51页。

② 《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上海点石斋石印本，1887年版，第25册第11页。

③ 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1页。对于雍正朝革除的土司数量，李世愉认为革除土司220家，其中湖广109家、四川69家、云南17家、贵州15家、广西10家；五省共设流官（指主官及分官地方的副职）152处，计湖广42处、四川23处、云南36处、贵州31处、广西20处。有学者认为共为160余家，即四川70家、湖广48家、云南18家、贵州15家、广西10家。（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台湾相



比，台湾基本上是随着移民向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进垦，官府为了防止汉番之间发生冲突，一方面设立番界，不许汉人越界垦荒，另一方面则设立土牛、隘口。即使如此，在汉人不断进垦以及垦拓成功后，官府也只好承认事实，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加以管理。四川则基本上是官府先行一步，设立行政机构之后，移民才进入求发展。如打箭炉地区“外通西域，内皆高山峻岭，实为天设之险”^①，雍正七年（1729年）设打箭炉厅，次年，移驻打箭炉的清军在各处设营伍、安塘置铺，修建塘房、烟墩、哨楼，以保障交通顺畅、商旅安全。打箭炉地区的经济得以发展，茶马交易更趋频繁，为此，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又令“建四川新设打箭炉厅”^②。当然，清廷不断将四川版图向西扩大，对进一步控制青海、西藏、云南等地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③

为了巩固藏族地区的稳定发展，清廷在川藏边

①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八，《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6册第725页。

②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十四，《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版，第9册第779页。

③ 以上参阅王纲：《清代四川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1页。

地实行派驻官兵制度，但藏族上层仍不时发生叛乱。乾隆时爆发的两次金川事件，使川西的金川地区人口损失惨重，许多村寨空无一人，战后清廷在两金川地区设立懋功厅及五屯，令驻守之绿营兵就地屯田，以此筹集驻防川边军队粮饷，减少内地供粮压力。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谕令军机处：“一俟官兵扫平金川，即应于两金川之地，酌安绿营设官驻守……但现在所有余粮，止可为初立营制之需，将来经久恒规，自当以屯田为妥。两金川地面可耕之土甚多，而绿营兵众屯种又其所习。”^①大小金川叛乱平定后，政府专门拨出资金支持军队屯田，“初办屯垦时，先给各兵口食”，并为士兵配置牛具、种子；为了让士兵安心边疆，政府“必令兵丁携眷来居”。对那些“情愿挈眷来居者”，官方给予大力鼓励，不仅酌量“资送”，而且对初至者，“照旧于应得钱粮之外，给与盐菜口粮，俟垦种已成再行停止”。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军事移民性质，这些军人在屯区的开垦，对传播农耕技术，对加强汉藏民族交流均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维州、保县一带，地瘠民贫，妇

① [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七，“圣训七”。



女皆来营贸易，其内本系番人居多，应行招徕开垦，兵丁如有缺出，并于番人内招募充补。”^①移民的不断进入使金川变成了藏、汉杂居地。除官兵耕种外，对投诚藏民也安排与汉人一体耕种，“此等头人所有家眷番众，拟分安于金川河东、河西，与官兵相错而居，并遵旨一体酌给牛具、籽种，俾得及时种艺”^②。军屯也吸引汉人迁入此地谋生。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渠县、什邡、长宁等县民人段万儒等十二户，情愿携眷赴金川。……又有洪雅、天全、打箭炉等厅州县民人王文琳等三十户，情愿自备资斧，携眷赴金川屯垦”。对于这些自愿入迁的汉人，政府均按照上述屯田兵丁眷属的待遇进行安插。为了保证这些内地赴边之汉人的利益，清政府还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如金川屯田就规定，对招徕的内地民户，每户给地30亩作为永久性财产。对那些路途遥远而带来家眷的民户，“准大口日给盘费银一钱，小口日给银三分，粮各一升”。至屯所配给房屋居住，并发给生产工具、耕牛以及粮种。“初种免粮五年”，自第六年起，交

① [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七，“武备志·屯田附屯练”。

② [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七，“武备志·屯田附屯练”。

纳少量的赋税，每户纳粮仅1斗2升，“或青黄不接，又准赴屯仓借贷，还新抵陈”。在种种优惠政策吸引下，金川地区户口日增，土地开垦殆尽。^①又如抚边屯也是在大小金川叛乱后，才安插汉民赴屯耕垦，“始有内地人民往来住牧，历年久自以为籍”^②。应该说，清代汉族移民对川西藏族地区的开发是很有成效的。

如果说经济往来以民间自发为主，那么，有清一代，在汉族与四川各地少数民族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官府行为则具有突出的导向作用。清廷通过一系列措施加速少数民族的汉化。清廷向来重视对少数民族的“教化”问题，雍正八年（1730年），四川巡抚宪德上疏，“新设建昌府蛮夷杂处”，他请求在“汉境内择大村堡，照义学例，建设学舍”，学生的来源是强迫性要求熟番子弟先入学，待学业有成以后，再让这些熟番子弟去教授生番子弟。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少数民族通过汉化教育而逐步向

① [清] 李心衡：《金川琐记》，卷三，“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99册。

② [民国]《抚边屯志略草案》。



化。^① 宪德奏言很快得到批准并实行。这说明彝族地区的汉化教育在清初已经开始。越轭卫的学校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还由卫学升为厅学。政府还向少数民族考生大开方便之门。早在乾隆二年（1737 年），川陕总督查郎阿上疏，请准四川境内一切土司所属地区童生和汉族一体应试，得到批准，“嗣后川省各属土司苗童，有志上进报名应试者，俱准其与汉民文武童一体考试，卷面不必分别，汉苗取额不必加坊”^②。这对在民族地区推广汉文化教育有一定的鼓励作用。随着官方教育的推广，汉族士人不断进入彝族地区，以舌耕为业，从事私人办学。据光绪《越崙厅全志》卷九“人物·流寓”及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人物·流寓”记载，有清一代，汉人名士深入到彝区设帐授徒，吸引了众多的当地人士，史料用“从学者众”进行描述。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被方志记载的名士都具有一定的身份或有一定的造诣，相信在移民中还会有众多不知名的士人在当地从事教育工作，推动

^①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九十，《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1985 年版，第 8 册第 215 页。

^② [同治]《理番厅志》，卷四，“边防”。

了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如雷波一带“在昔风教未开”，自开设学校后，到光绪时“近一二百年来成均乡荐代不乏人，士习彬彬，颇知礼让，遵文守教，足迹不履公庭，盖声教之濡染者久也”。^①四川的彝族地区在清代属于宁远府管辖，其汉族移民也包括闽粤人口，如同治《会理州志》卷二记载其境内有南华宫3座、天后宫3座，光绪《越嶲厅全志》卷二记载有南华宫1座等。

藏族地区学校的设立大概在康雍年间已开始。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岳钟琪带兵入藏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在川藏干线上设置粮台，使留驻打箭炉、巴塘等地的汉族士兵和商贸小贩日益增多，于是在两地设立私塾，供汉人及藏族子弟入学。雍正时四川巡抚宪德请求在夷蛮杂处地设立义学，选取本省“文行兼优之士延为塾师，令熟番子弟来学，俟学业有成，俾往教生番子弟”。此折得到礼部批准。^②义学的目的是系统培养已基本汉化的熟番，然后让他们去教育生番。道光五年（1825年），李

① [光绪]《雷波厅志》，卷十六，“学校”。

②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九十，《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第8册第215页。



涵元在金川绥靖屯创兴义学，延师训课；崇化屯也捐集银两创设学堂多所。^① 这些学校往往采取单一的汉语教学，强化藏民汉语水平，清末出现了藏民“送子读书，习学华语”的潮流。将读书与应试做官连为一体，这是鼓励少数民族发展教育的最好手段。但土著参加考试又往往会与汉族居民发生矛盾，地方官员极为重视协调工作。雍正八年（1730年），四川巡抚宪德就曾因茂州学子考试而上疏，茂州羌民久列版图，载粮入册与齐民无异，应“准其与汉民一体应试，卷面不必分汉羌，取额不必加坊，一体凭文去取”。这一建议似乎未曾落实。乾隆初年，四川学政隋人鹏上奏：要求“嗣后四川所属一切土司苗童，有志向上报名应试者，应准其与汉民文武生童一并凭文去取”。这次上疏得到肯定回答，“应如所请”。^② 读书与致仕相联系，吸引越来越多的藏民入学求知，成为推动藏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反过来又加快了藏族汉化进程。汉人在藏区的社会活动，在促使藏民汉化的同时，也有汉人夷

① 《阿坝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6年编印，第28~29页。

② [同治]《理番厅志》，卷四，“边防·筹备”。